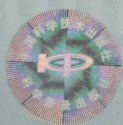


幕友师爷秘书

钟小安 编著


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幕友师爷秘书

钟小安 编 著
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幕友师爷秘书/钟小安编著, —北京:
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5046-4500-5/G · 409

I. 幕… II. 钟… III. 史传—教育

IV. G42. 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144484号

自2006年4月起本社图书封面均贴有防伪标志, 未贴防伪标志的为盗版图书。

幕友师爷秘书

钟小安 编 著

出版发行	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排 版	新天地文印中心
印 刷	新颖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11.25
字 数	292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5046-4500-5/G · 409
定 价	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 言

——绍兴师爷在秘书史上的地位

“幕府”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，古代出征的将帅，军还则罢，理无常处，以幕帘为府署，所以叫“幕府”，这里的“幕”则指军队驻扎用的帷帐。战国时的“幕府”仅指出征将帅办公的署衙。按照许慎《说文》的解释：第一个字“幕”是“帷在上曰幕”，第二个字“府”是“文书所藏之处”。“府”字更早的基本含义仅仅是“仓库”，但它最后却有了“政府”的涵义，用来指政府办公的地方或地方政府，但不指中央政府。这两个字合起来即是“幕府”，其含义的进一步引申则是“军事政府”。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提到的有关“幕府”的材料看，秦汉时期的“幕府”也主要指的是军府，行军出征将帅之府署称为幕府。《册府元龟》说：“战国之际，始谓将帅治所为‘幕府’”。

史籍最早出现“幕府”的是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所记：“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，常居代雁门，备匈奴。以便宜置吏，市租皆输入莫府，为士卒费”。（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2449 页）“莫”通“幕”。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记载了冯唐向汉武帝说的一段对话：“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，跪而推毂，曰阃以内者，寡人制之，阃以外者，将军制之。军功爵赏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。此非虚言也。臣大父言：李牧为赵将居边，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扰也。”（见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2758 页）从这段话可知，李牧为将拥有下述三项权力：一是“便宜置吏”。这是指将帅可以根据战争形势自主设置僚佐属吏。所谓“吏”，许慎《说

文解字》云：“吏，治人者也”，可见，是将帅之下管理“士卒”的官。这些吏既包括与士卒为伍、率之冲锋陷阵的武职军官，还包括将帅军府中辅佐将帅指挥作战的文职军官。这是组织人事方面的自主权；二是“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”。这是财政上的自主权；三是“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扰”。这是军功赏罚的自主权。最重要的是拥有人事自主权即“便宜置吏”，这是后来的幕府制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。

—

我国从古代奴隶社会后期就有秘书工作的记载，同时也就有了从事秘书工作的各类人员。西周时期的士接受“官府之学”的教育，掌握了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统治经验，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解，善文章、长辞令，属知识分子阶层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宗法制、世袭制逐渐瓦解，旧贵族世家纷纷没落，士的特权丧失，“学在官府”的局面被打破，私人办学之风盛行，许多平民拜师求学于私门，也成为士，士的数量遂大增。他们为了寻求个人出路或实现抱负，投靠、依附于某个国君、贵族或集团，陈述政见、贡献方略，以求得到重用。各国君主在强则存、弱则亡的兼并形势下，纷纷探求富国强兵之道，迫切需要士帮助他们出谋划策，实现强国、统一天下的大业。许多士成为为君主谋划、提供咨询、起辅助决策作用的顾问、谋士、幕僚，他们“不治而议论”，往往兼任文书起草工作，实际上是君主的秘书。这些士大都思想活跃、满腹经纶、富有谋略。他们贡献的策略，往往对各国的兴盛，天下形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如公元前626年，士由余出使秦国，向秦穆公列数中原诸国政治形势、演变趋势，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见解，秦穆公十分振奋，千方百计将由余请来当了客卿，专事谋划，对他言听计从，依其策略而吞并小国十二，扩地千里，遂称霸西戎，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。当时，象由余这样的客卿，不胜枚举。士不仅担任君主的秘书，也为一些贵族私人所招纳，如

齐国的孟尝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楚国的春申君、魏国的信陵君和秦国的吕不韦等人都纳士数千，称食客、门客、幕友或舍人。这些纳士的贵族从幕友中挑选人才，替他们治理家政，或帮助谋划家事国政，或委托办专项事务，或替他们拟写书信、编撰书籍，如吕不韦曾组织门客撰写《吕氏春秋》一书。（见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中华书局1959年版2510页）这些幕友的职掌主要是参议谋划、起草书信、处理日常事务、承担交办事项，实际上是主人的私人秘书，即为后代幕僚的祖师。自清朝起，一概称幕友为“师爷”。大批士加入秘书行列，不但壮大了秘书队伍，为秘书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、带来了新观念、新思想，提高了秘书工作的质量，开创秘书工作的新局面，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，同时也提高了秘书人员的地位和声誉，对日后的秘书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师爷无官衔职称，仅受聘与幕主而并非行政委任。幕主称师爷为“老夫子”、“西宾”，师爷称幕主为“东翁”、“东家”，彼此虽以宾主相待，实系雇佣关系。幕友由幕主自己延聘，自州县至督抚，都聘有幕友办事。它不属于国家行政系统，因此，幕友的聘辞、工作安排、人数以及待遇，都独立于官府之外，属于私人秘书性质。他们和幕主的关系是宾主关系，不是上下级关系，因此在地位上是平等的。幕友只对主官负责，为主官服务。主官对幕友往往给以很高礼遇，以宾客相待，视为师友。幕友没有任期，主官聘用幕友时，双方之间没有法定的依附关系，幕友的人身是自由的，合则留，不合则辞退或告辞。

师爷协助主官为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司法等方面的发展出谋献策。他们熟悉朝廷律例，常能协助办案，替人解围，垄断司法审判，特别是满清政府中大多数旗人不谙汉族民俗，在案件审理、纠纷解决等方面要靠师爷的才智来帮助。师爷靠自己具有的刑名律例（法律）、钱粮会计（财会）、文书案牍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才能辅佐主官，称为作幕、佐治或佐幕，在幕府中为

幕主出谋划策、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；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；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，联络官场，凡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师爷是幕主深信不疑之人，所以幕主将政务乃至家政都托付师爷去办，使他们掌握了部分实权，不但有参谋权，在一些交办事项中还有决策权，如包世臣曾被朱珪派往地方处理刑事案件，凡审理案件都由他裁决，不需要请示朱珪。幕府的工作，以刑名、钱谷、批牍（即批答文件）为主。所理之事，可谓上至国计，下关民生，囊括本衙门内的所有日常事务，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，都往往出自师爷的谋划。如官文任湖广总督时“巨细事不甚究心，多假手于幕友家丁”（见《庸庵文编·卷四》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），不认真做事的官吏大都如此，而陶澍“澍见义勇为，胸无城府。用人能尽其长，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。在江南治河、治漕、治盐，并赖王凤生、俞德源、姚莹、黄冕（都是幕友）诸人之力”（见《清史稿·列传一百六十六陶澍》中华书局1977），可见勇于做事的官吏更靠师爷协助。

二

越文化源远流长，河母渡文化显示的越先民的发达文明、高度先进，仍令今人赞叹不已。北临钱塘湾，南依会稽山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越先民的聪明天赋。越文化积淀着大禹治水、勾践发奋、名臣死谏、忠将殉国和报仇雪耻的血性风骨，江浙是一个人杰地灵、人才辈出的地方，历史上产生了众多的文化精英和英雄人物，他们不仅丰富了越地的灿烂历史，也影响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，形成了自强不息、耻为人后、敢于勇领潮流之先、善于发挥独立创造精神等独特的越文化传承特征。

绍兴自古就有重史传统，清朝更有浓厚的史学空气。师爷作为一种特殊职业，尽管地位有些特殊，非官非吏，亦宾亦友，可以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这一行业，有专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即汪辉祖所言“幕之为学，读律而已”。但学幕要学得好，也非易事，

关键是素质基础要好，有经书文史之根底。而这种根底绝非靠“学幕”所能解决，师爷业中有“多读一年书，少读十年律”的说法。名幕张廷骧曾告戒欲习幕者：“文理太陋，资质太纯，似亦不必误入此途，不如早寻他计。故凡有心习幕者，当先自量其材力而后从事于此，庶不自误生平。”与一般读书人比较，师爷因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周密的思维习惯和干练的办事作风。

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，以其聪明才智，效忠幕主，不仅巩固壮大幕主的地位权势，也为中央和各级行政官吏所瞩目与重视。

三

浙江绍兴人入幕为僚由来以久，明朝一代已有不少人学律作幕，当时京中胥办，“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”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，并闻名于世。嘉靖年间被誉为“明代第一才人”的徐渭，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，是早期代表人物。绍兴师爷在清初时期，尤其是在顺治、康熙之时，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、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，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。会稽籍幕友龚未斋在所著《雪鸿轩尺牍》中称：“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”，足以说明在乾、嘉年间绍兴师爷的盛况。清代有句俗谚说：“无幕不成衙”、“无绍不成衙”。“绍”，指绍兴籍的师爷和书吏，其中又特别强调绍兴籍师爷。清朝府、县两级师爷，属于低级师爷，他们多数来自绍兴。大抵功名不高，甚至没有功名。但他们具有“专业知识，家传秘术”，俨然是一门独家手艺，清代几乎所有基层政务，全由他们一手包办。

入幕者主要有两类：一类是科场失意者、学者、名流、富有阅历的退休或被黜革的官员。他们或为求取出路、或为生计而投入地方大员门下为幕友；一类为专业幕友。随着对幕友需求量的增多，民间一些地方开设了专门培养幕友的私学，称“幕馆”，幕馆招收士人，教授他们揣摩社会风气，传授处理文书案牍和官衙日常事务的技能，介绍官场的礼节、应酬。学幕多随师学徒，不

少人父授于子、兄授于弟、世代为幕，更多人则通过亲戚、世谊、乡谊等各种关系，跻身于幕友之列。这些经家传或幕馆培养出来的幕友，既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、博学多才、知识面广、善于文章，又精于世故、通达社会、熟悉吏务、办事干练、足智多谋，地方官很乐于聘用。

清朝中央各部院的秘书机构设置较前代更为健全和完备，有主事掌文案章奏，司务掌出纳文移。六部诸司主事，与郎中、员外正式并列为六部司员，在尚书、侍郎之下又增设堂主事一职来掌理文牍事宜。此外，各部还添设若干名笔帖式的小官员，以掌翻译满汉章奏文书等事。地方官衙正规编制中秘书职务的设置，一般都承明制。省一级和府有经历司经历、都事，照磨所照磨，知州以下有吏目，县六房办事的有典吏、号吏、稿书等人员。地方官衙除上述有正式编制的秘书人员外，尚有一大批编制外的秘书人员，即由地方主管官吏聘请来帮助自己处理行政事务的人员，这批人员在文献上被称为书吏、幕友。书吏又称书办、书役、部办、典吏、稿公，在编制之内者，五年役满则考职，非编制内者，称帖写或邦差；幕友又称幕僚、幕宾、幕客、幕师、幕席、西宾，但一般都叫作幕友，俗称师爷。老百姓统称为“刀笔师爷”。幕友在行政衙署办文者，曰“文案”或“内文案”；在司法部门办案者，曰“刑名师爷”或“刑席”；于经济部门办牍者，曰“钱谷师爷”。这个历史事实表明，封建社会进入清朝以后，地方政权机构的秘书工作已带有相当强的专业性。

师爷名义上虽然是“佐官以治”，实际上往往是“代官出治”。因此，他们是“操三寸管，臆揣官事”，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。他们的活动，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，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。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，对于后世的影响，也是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这主要是因为，明清之际的多数地方官员，是科甲出身。他们所学的就是“四书五经”、子曰诗云；他们所熟悉的的就是八股文的“起承转合”。一旦外放去当

地方上的父母官，要去征粮收税、审人办案、送往迎来、上报拟稿、下发告示等，一样也做不来。他们在这些日常事务中，脑袋里是一盆浆糊，非得一些具有“专业知识”的师爷们帮衬，乃至替他们当家作主不可。

四

由于师爷地位特殊，熟识政务，舞文弄墨，头头是道，故能勾结书办、胥吏，以衙门为巢穴，贪赃枉法，甚至形成一个无形的政治集团，窃取部分督抚州县的职务。出现“内掌曹郎之事，以代六部出治者，胥吏也；外掌守令督抚之事，以代十七八省出治者，幕友也”（《清朝经世文编》）的局面。幕友中也有一些劣幕利用职权，营私舞弊，成为清代地方政治黑暗的一个原因。

在许多人的心目中，师爷都不是好人，而是一群心术不正、阴险奸滑、舞文弄墨、谋私作恶的家伙。在不少小说和戏剧中，师爷也被派为反角，成为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。实际上，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，即以偏概全的误区。历史的真实情况是：师爷有良莠之分，好师爷在历史上被称为“良幕”、“上幕”，坏师爷被称为“劣幕”。师爷的良莠是有发展阶段的，从师爷的整体状况看，清朝中期以前，师爷中“良幕”居多，清朝中期以后，师爷逐渐“劣幕化”，坏师爷越来越多。但即使到了晚清，也不能说凡师爷皆坏。

绍兴师爷中确实有一些劣幕和恶幕。杀害“鉴湖女侠”秋瑾的主谋章介眉，就是“恶幕”的代表人物。1907年7月，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，知府贵福请示浙江巡抚张曾敳如何处置，当时章介眉正在张曾敳门下当刑名师爷，他极力怂恿张曾敳致电贵福将秋瑾就地处决，来个“先斩后奏”；后增韞继任巡抚，章介眉又怂恿其平毁秋瑾墓。1911年11月绍兴光复之后，绍兴都督王金发逮捕章介眉。这时章介眉使出苦肉计，表示愿意“毁家纾产”，捐献房产田产，引得王金发上当，将他释放。此后章介眉

又百般钻营，摇身一变，先后成为袁世凯的财政咨议、总统府秘书，不仅将当年“毁家纾产”的房产田产悉数收回，最后还借浙江督军朱瑞之手杀害了王金发。正是像章介眉这等阴险狡诈、劣迹昭著的劣幕，败坏了绍兴师爷的声誉，使得“绍兴师爷”几乎成了恶讼师的代名词。

师爷中的良幕亦不少，如雍正年间，当浙江总督李卫派人去苏州逮捕无罪良民时，苏州府内绍兴师爷童华以手续不全为由拒不执行。后雍正闻知此事，斥责童华沽名钓誉，童华据理力争：“臣竭力为国，近沽名；实心为民，近于誉。”终于使雍正为之折服，并予重用。名幕汪辉祖从幕34年，先后为16位州县长官作幕友，后入仕任湖南宁远知县。他在任上针对该县“积逋而多讼”、“流丐多强横”，治安情况不良的现状，“即捕其尤，驱余党出境”，并在处理不法者时让老百姓前来观听，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，境内治安状况为之改观。山阴人王汝成在山东巡抚陈庆偕幕府时，平反大量冤案，为民昭雪，有关案卷曾用布裱存，作为后学之圭臬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八月，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，派钦差大臣伊利布赴广州续办妥协投降之事。当时，山阴名幕何大庚正在广州知府余保纯衙内任职，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和义愤，在广州府学明伦堂张贴《全粤义士义民公檄》，怒斥英国帝国主义贩卖鸦片、掠我资财、占我领土、害我民众、淫我妇女等罪行，呼吁广东人民一致对敌。山阴名幕娄春藩在八国联军围攻津埠，“日夜炮声震天地，弹下如雨”的险恶环境中，“勿为动，仅以何永盛所统练兵千余名，与敌军相峙”，并“屡获大胜”，英勇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大举进犯。同时，他“力主早日停战，以促成和局”，希冀尽早结束战争，维持和平安宁的局面，以巩固清廷统治。中日甲午战争期间，绍兴师爷出身担任辽阳知州的徐庆璋，为抗击日本侵略者，“募饷练兵，号镇东军。烟边设防。自辽阳而岫岩、海城、复县三六百村士民，编团数万人，以辽南峒徐珍为练长，勒以兵法”，随

后屡败日军，俘虏百数人，坚守辽阳长达五个多月，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，为捍卫民族独立作出了贡献。这些名幕可说是“良幕”的代表。（见任桂全主编《绍兴市志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366-3367 页）

五

绍兴师爷撰著甚多，为学幕者必读之书，著名的有《入幕须知五种》、《秋水轩尺牍》、《雪鸿轩尺牍》、《福惠全书》等。《入幕须知五种》一为《幕学举要》，系乾隆年间万枫江所著，分“盗案”、“命案”、“奸情”等十一目，“论习幕之道，挈要提纲，语从阅历而来，诚为后学津梁于直吏情形尤了如指掌”；二、三为《佐治药言》、《续佐治药言》，系与万枫江同时代之汪辉祖著述，前者上卷为“尽心”、“官幕异誓”、“志趣宜正”等六十三目，下卷分“敬城隍神”、“敬土神”等六十一目。后者分“官声在初莅任时”、“彰前官之短”等五十目，为佐理政务体会；四为《办案要略》，系清代乾隆中叶王阴庭所撰，分“论命案”、“犯奸及因奸致命案”等十四目，夹叙夹议，介绍办案方法与经验，王氏尚有《刑钱必览》、《钱谷备要》、《政治集要》等书行世；五为《刑幕要略》，作者佚名，分“办案”、“斗殴”、“人命”等二十二目，实为刀笔吏经验教训之谈。这些著述对今天的秘书亦不失借鉴之用。而当时师爷注重“才、识、品”，更值得我们汲取。

黄六鸿《福惠全书》认为，幕友“才、识、品”三者之中“品为尤要”，“兼长为难，先取品，识次之，才又次之；才识不足，犹可群力相辅，品一不正者，虽有才智安足贵乎”？就幕方而言，作幕虽为生计，但依伴他人，仍以“立品”为先。汪辉祖《佐治药言》认为：“信而后谏，惟有亦然。欲主人之必用吾语，必先使之主人不疑我行。为主人忠，大要顾名而不计利……故欲行吾志者，不可不立品。”可见官幕之间，“利”之外，尚讲究行为规范，注重“道义”，即所谓“幕道”。幕友之道，尽宾之义，贵在以公

事为重。“宾利主之才，其初本以利交”。然而，幕府之宾主关系又超乎此。就官方而言，对幕友之求首在“品”，以“品端学醇、人厚忠恕之士”为良幕。汪辉祖于《病榻梦痕录》中指出：幕友“以效力于百姓，使邑人皆曰主人贤，庶几无愧宾师之任”。这与当代秘书注重思想品德是一致的。

绍兴师爷在入幕时讲究“幕道”，实际上是注重素质要求。汪辉祖主张：

1、“立心要正”，即心须正直，“正心乃为人之本”，“心正而其术始端”；

2、“尽心”，即尽心于公事，佐治应以尽心为本，乃“幕道”之实质。“心尽于事，必竭所知所能权宜轻重，顾此虑彼，挽救其以著，消于未然”；

3、“尽言”，即努力做到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。“一人之谋，不敌两人之智。如以是非切己，坐视其失，而不一词或以己所专司，不容旁人更差一解，皆非敬公之义”；

4、“勤事”，即勤于办事。幕友勤事，不仅在于为主官考成，以为顺应，更有：“办理幕务，最要在勤一事。入公门伺候者，不啻数辈，多延一刻，即多累一刻。如乡人入城探事，午前得了，便可回家；迟之午后，必须在城觅寓，不惟费钱，且枉废一日之事。小民以力为养，废其一日之事，即缺其一日之养，其羁管监禁者，更不堪矣，如之何勿急？况事到即办，则头绪清楚，稽查较易，一日积一事，两日便积两事，积之愈多，理之愈难，势不能不草率塞责，讼师猾吏，百弊丛生，其流毒有不可胜言者。”（见胡学亮《从政心得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93页）故此，“勤为尽心之实”；

5、“慎事”，即审慎从事。幕中之事，以刑名为重，人命关天，故办事不可草率；

6、“公事不宜迁就”，即坚持原则。“宾之佐主，所办无非公事，端贵和衷商酌，不可稍介以私……以主人意见不同，稍

为迁就，便是私心用事。盖一存迁就之见，于事必非斡旋，不能适得其平。”等等。（转摘自《绍兴市志》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365-3366 页）

以上这些主张，与当今秘书素质要求甘于吃苦、乐于奉献，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、秉公办事、坦然从事、敢讲真话、敢报实情、敢揭问题、切忌计较得失、贪图名利，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非常相似。另外，绍兴师爷谦虚待人，善于辞令，精通文笔，灵活通变等特长也是当代秘书应不断学习掌握的。

六

古人曰：“爱出者爱返，福来者福往”，人际之间是“互惠”与“互动”的，秘书的社会角色尤其如此。品德魅力、无穷无尽。“火心要虚，人心要实”，诚实与谦虚的品质之所以被作为起码的规范约定下来，被人所重视，因为诚实与谦虚是一种高尚的人格；是对自己、他人和社会负责的表现。感召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人格高尚或是人格卑微的“对应物”。对待他人真心诚意、实实在在，办事说话有根有据、守诺守信、不捕风捉影，把问题摆在明处，不在背后搞小动作，不要奸藏滑，而光明磊落、踏踏实实，拥有此等胸怀与人相交办事，必能赢得好感；秘书人员往往被推向矛盾的端点与焦点上，应处变不惊，宽容忍让之，乐于助人，关心他人的境遇和需求。好人缘、强感召力是智力的基础，而这一基础的奠定则是自己友好对人、善意待人、慷慨助人所赢得的酬赏。

对绍兴师爷的毁誉历来不一，贬者认为绍兴师爷奸刁乖巧，心胸狭窄，口不饶人，笔如刀剑，往往置人于死地。褒者认为他们精明能干，嫉恶如仇，不畏权贵，有正义感。李乔先生在《中国的师爷》（见《中国的师爷》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，目录页）一书中概括了绍兴师爷的几种性格：

1、倔强、有骨气；

- 2、傲岸、自矜、易怒；
- 3、苛刻、睚眦必报；
- 4、精细、谨慎、机警、刁钻；
- 5、圆滑、庸碌、有媚骨。

这些性格的形成，植根于地域文化的土壤之中，越文化的传统“基因”决定了他们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。绍兴师爷性格中的“倔强、有骨气、傲岸、自矜、易怒、苛刻、睚眦必报”，也可以说是越人一种普遍的性格特征。“倔强、有骨气”是越文化的一种传统，也是越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。杨义先生曾说：“剑文化是古越文化一大特色，堪与东晋衣冠南渡后的书文化并列为于越文化的千古二绝。……所谓剑文化，蕴涵着复仇、尚武、励志自强的精神素质。”（见《杨义文存》（第五卷），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，第550页）因倔强、有骨气而傲岸，而有仇必报。鲁迅的姻亲陈秋舫，当年寄食周家新台门被鲁迅祖父骂做“在布裙底下躲着的没出息的东西”而怀恨在心，因此周介孚科场案发，身为师爷的陈秋舫乘机报复，怂恿审理此案的苏州知府非严加查办不可。师爷的睚眦必报由此可见一斑。王充问孔刺孟，勇敢无畏的精神，乃至陆游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明末，王思任“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，非藏垢纳污之区”的呐喊，正是这种越文化传统的明证。

“精细、谨慎、机警、刁钻”是师爷群体的越文化历史积淀的体现。越王勾践“十年生聚”并牢记“十年教训”，实是一个创举，为当时其他诸侯君王所不及。此种秉性，因越地历来重视教育而绵延不绝得以发扬，耕读之风，代代相传。同时，越文化不为地域所囿，能不断汲取其它文化精华，发扬光大。积淀深厚的越文化，滋润了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越人的聪明才智，持续不断地产生了包括绍兴师爷在内的各种人才。著名学者孙星衍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，秋瑾的祖父秋桐豫当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师爷，辛亥革命元老朱执信的先世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先世、

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先世，都当过师爷。甚至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、外祖父万青选都当过师爷。他们以处事灵活、豁达、圆通，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。相传曾国藩的部将早年打仗之时，罕有胜迹，以至于给皇上上交施政汇报时，不得不比较客观地写下了“屡战屡败”一词，并准备好了接受皇上的圣颜大怒。然而，他的幕僚在二审施政汇报之时，很巧妙地把“战”与“败”二字作顺序上的调换。这样一来，屡战屡败的曾国藩却因为屡败屡战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了皇上的褒扬。而这位调换二字顺序的绍兴师爷，也因此而被曾国藩尊奉为“一字之师”。师爷的“精细、谨慎、机警、刁钻”由此可见一斑。

而“圆滑、庸碌、有媚骨”，则是绍兴师爷传承越文化传统的良莠不齐之具体表现。在千人学幕，成者不过百余人；百人就幕，入幕者不过十余人的激烈竞争下，师爷为了保住饭碗，养成了这种性格。在竞争中，即使对手使用了流言、阴谋，也只有少数会愤怒进行正面报复，大多数师爷会默默承受，忍气吞声，或是暗地里使诈，从而有在处理案牍时“工于弥缝，巧于趋避，妙于抑扬”，管理政务时“墨守成规，导幕袭故，推托诿卸”的圆滑和机巧。师爷一职，名声本来很坏。师爷中确有不少劣幕，或助纣为虐，鱼肉百姓；或欺上瞒下，营私舞弊；或朋比为奸，包揽诉讼。汪辉祖也自称，从事这种职业，是“寄人篱下，鸡鹜夺食”。他的父亲，曾从事过这种职业，但很快就自动不干了，以为“有损吾德”。但这种职业，又关系老百姓的安危生死，至为重要。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道德，著书立说，以教后人。汪辉祖青年时，在做官的岳父那里，看到那些幕僚们收入不错，可以养家糊口，他也跃跃欲试。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家人时，他的祖母和母亲同声斥责他，不要忘记父亲的遗言。汪辉祖郑重发誓以后，才正式当了幕宾。

师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，尤其在新政权建立或政治局势动荡时，肩负总揽大权、收集材料、处理事务的重任，他

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、绅士、商人等群体，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司法等诸多层面，成为封建专制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，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著。

绍兴师爷作为私人秘书，从个体而论，各有明确的工作目标，其职责专业性很强，他们知识面广、社会经验丰富、文化程度高、业务能力强、功能全面、作用重要，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秘书人员；从群体而论，他们是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，其职掌几乎囊括了官衙中所有日常事务，成为无衔之官、无职之吏，形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，在吏治腐败、官员无能的清朝，起了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作用。绍兴师爷不仅在官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发挥稳定政局的重要作用，即便在辛亥革命之后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虽已解体，但其影响却继续存在。